

羅青書目簡

• 113 •

根據一九七四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「現代中國詩選（一九一七——一九四九）」有許多關於廢名的新資料，可為我那篇廢名研究資料初篇做一點補充，以便讀者參考。選集裏共選廢名詩六首（「海」，「掐花」，「壁」，「宇宙的衣裳」，「十二月十九日夜」，「街頭」），並謂「廢名是以寫小說及小品文著名，詩作發表不多，詩集似乎就只有『水邊』一本，現在我們已無法找到這本書了。因此我們所選錄廢名的詩，也就只限於從『新詩』，『文學雜誌』及『中國新文學大系』、『聞一多全集』裏的『現代詩鈔』所見的近十首詩。但從這近十首詩中，我們却發現廢名的詩在中國的現代詩中，是非常獨特的一家。」又謂：「廢名的詩，亦在表現一種純粹的經驗，有點像超現實主義要表現的潛意識的夢幻世界，在這種夢幻世界當中，許多不相關的意象便融和一片。廢名的作品像『十二月十九日夜』便有這種傾向：『深夜一枝燈』居然『若高山流水』；『星之空』居然『是鳥林，是花，是魚。』這種想像構成了超現實的境界。」然我却不願冒然稱廢名為中國新詩中「超現實主義者的鼻祖」。因為廢名詩中超現實的素質，並非從西方「達達主義」或「超現實主義」中進口來，而是從中國儒道二家滙入佛經轉化蛻變而出的。在他的詩中杜工部，李義山，甚至詩經的影子都歷歷可見，這與時下一般不知「古典」的人，當然有別。

「詩選」中對廢名詩中的節奏，也有一番說詞，雖然言之成理，但我却不敢苟同。文曰：「看廢名詩的節奏，正如他的詩境一樣有着頗突出的表現。例如在一首詩中，往往發現有散文語法的句子出現，阻礙着整個文

氣的進行。這種處理方法，也許會使人覺得拗口和生硬：但從另一角度看，則不失為節奏上的一種特色。」老實說，廢名的詩語言，尚未達到成熟的境地，與馮至，聞一多，卞之琳是無法相比的。然他在語言上所犯的毛病，亦可說是新詩「草創期」與「摸索期」的通病。其時，白話用語在詩中尚未自青澀中完全解脫，文白夾雜不順的地方極多，能够寫簡潔的白話文者已不容易，對一個想在詩中自創新聲的詩人來說，更是難上加難。我們不必苛責廢名，但為之文過飾非，也無必要。

「詩選」中提到善兼仁 (Jos. Schyns) 編著的 *1500 Modern Chinese Novels and Plays* (一九四八年出版)，並引該書二一五頁中所述廢名在蘆溝橋事變前的文藝活動，十分珍貴，值得參考：

(一) 由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在「努力週報」發表作品，稍後把所發表的小說結集成「竹林的故事」，

由北新出版(一九二五)。

(二) 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〇年，在「語絲」發表「橋」。

(三) 由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，在「駱駝草」發表「莫須有先生傳」。

(四) 由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為「人間世」撰稿，當時他的重要作品是「讀論語」。

(五)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則為世界日報的文藝副刊「明珠」寫稿。

由此可見小說和散文在他作品中所佔的地位。因他「天生奇拔的氣質和後來對於道佛的偏好」，使他的小說和散文都「走入神秘玄妙的道路」。「廢名以為人的著作有兩類，一是有全書在胸而後下筆者，一是無全書在胸而涉筆成趣者。他在『橋』裏又說：『人生的意義本不在它的故事，而在渲染這故事的手法。』故此廢名的小說全不注重人物情節，而重在氣氛、情調的渲染。他的作品和『竹林的故事』，『莫須有先生傳』都是他所謂『涉筆成趣』之作。這種寫法，脫離了小說創作的傳統，却更接近於詩的表現。如在『橋』中有這麼一個畫面：

全個村裏靜悄悄的，村外稻田則點點是人，響亮的相呼應。(頁三十九)

故國神遊 第三集

華振之著 定價50元

這是老殘、徐霞客的現代版。這是我們認識祖國的另一個起點。

華振之先生大半生時間服務交通界，因為工作關係，使他能够遍遊中國大陸名山大川。他是書香世家，博聞強記，在他生動而細膩的筆下所描繪的故國風光，強烈地喚起國人故國純醴之思。

阮毅成先生說：「凡古今人之遊記、詩歌、圖片，皆多方收集，排比珍藏。源頭既有活水，則筆下自屬清麗。有如黃河，一瀉千里。又如長江者，橫貫中華。作者固得心應手，讀者更如逢故人。古人謂：『相看兩不厭，只有敬亭山』。我於華君之作，固相看兩不厭者，其可愛更過於敬亭山也。」

橄欖樹

周寧著 定價35元

現階段從事批評工作的人，不算少數，若是我們細心體察，這些人之中，通常最欠缺的不是學識，而是「誠摯」——在本書中，您不會感覺到這一種缺憾。

批評是一種藝術。詮釋的深度和高巧、肯定或否定價值之間的微妙互變、溝通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靈犀相繫，在在是一種「恰到好處」的呈示。其間之過程正如嚼食一枚橄欖果，必須細細體會，才嚐得出那股特殊甜醇的果味，本書取名「橄欖樹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全書收錄了作者發表在「中外文學」、「幼藝文藝」、「幼獅月刊」、「文藝月刊」、「書評書目」……的文章，頗能見出作者對作品的識見，我們很樂於向讀者推荐本书。

書評書目社

這正是詩的境界。」這段話說的十分得體恰當，真是一針見血之論。像他這樣寫小說五四以來可說是絕無僅有，就是七十年代的今天，也不多见。王文興「筆記體」的「家變」或類似之，因為王書既能「涉筆成趣」又能照顧全局之故也。當然，王之照顧全局與廢名又有不同。王氏是「事」「意」兼顧，廢名則以「意」貫之。所以他的「橋」在發表時，是可以前後顛倒，全然不顧其連續性的。在這一點上，川端康成倒是與之相契。

「詩選」中對廢名平生的介紹十分簡略，只說他是「一九〇一年生於湖北黃梅。初為武昌某小學教員，一九二二年入北京大學預科班，兩年後入北大英國文學系，一九二九年畢業。畢業後在母校任教，中日戰爭期間返回故鄉教中學，抗戰勝利後又回北大任教。作品多發表於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和文學雜誌」。一九四九年以後便不再看見他發表作品。以廢名之性格思想以及文風，不能見容於共黨教條，是當然的事。記得「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」有一句話如下：「清晨，滿是露珠的荷葉上有一隻青蛙，動也不動，好像羲皇時代的老百姓。」這或許是廢名所嚮往且已達到的境界了吧。